

一 沉渣泛起

1.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标志。这场战争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它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开始新的经济危机，国际局势风云突变，日本内外矛盾加深以及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发生的，同时也是日本传统的侵华政策的一次大暴露。

近代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而不能自拔；反观日本，与中国的情况大不相同，日本自1868年改元明治以后，结束了幕府的封建统治，实行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维新改革，逐步向欧美资本主义列强靠拢，并力图争取成为

其中的一员。

日本的这种改革，就对外关系而论，一开始即具有强烈的扩张倾向，而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自然就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主要目标。就帝国主义侵略而言，日本虽是后来者，但的确是一个最露骨最凶恶的敌人。

早在中英鸦片战争的消息传到日本之际，其时日本本身亦面临民族危机的严酷课题，于是就有人鼓吹“向外宣传国威，攘除夷狄，开疆拓土”，进而“最终席卷五洲，统归皇朝，皇朝永为五洲之宗主”日本政府还将对外扩张提到国策的高度，1868年天皇在其《宸翰》中公然宣布说：“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这就有力地说明，日本的对外政策，从一开始就与“开疆拓土”的野心密切联系在一起。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于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其《兴中会章程》中痛心疾首地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已效[尤]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孙中山以其审视的目光，既警惕欧美老牌帝国主义的“虎视鹰瞵”；更没有忘记新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瓜分豆剖”。让我们循着日本侵

略者的罪恶行径，作一简要回顾。

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使古老的中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被政治野心家袁世凯篡夺，袁世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1915年日本利用袁氏的帝制复辟野心，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妄图通过袁世凯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

在北伐战争中，日本支持国民党右派绞杀大革命。在此期间，日本政府在加藤高明主持下，推行币原外交，它打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幌子，涂上“睦邻外交”的色彩，然而这些娓娓动听的词句，仅仅是策略上的变更，它的公开声明与军部实行干涉的隐蔽谋略，配合得相当默契。当北伐军进入长江流域时，币原派遣其心腹外务省条约局局长佐分利贞男前往南方，与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黄郛过从甚密。佐分以其敏感的政治嗅觉向币原报告说：目前蒋介石派与武汉共产派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当币原于1927年接获一系列外交情况之后，他断定蒋介石是“口头上的过激派，行动上的稳健派”。蒋介石到达上海不久，1927年3月底即向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表态：在劳资问题上“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希望

上海商界“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蒋介石得到日本帝国主义和上海大资产阶级乃至流氓帮会的支持，遂下定“清党”的决心，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大屠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遭屠杀多达300多人，500多人被逮捕，5000多人下落不明。继上海四一二政变后，广州、南京、杭州、福州相继发生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屠杀、镇压。同月18日，在南京宣布成立国民党蒋记“国民政府”，宁汉正式分裂。从这一事件的全过程中不难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起了破坏中国革命、充当幕后操纵者的恶劣作用。

田中义一其人，是一个狂热的日本扩张主义分子，曾窜入中国东北进行窥探。田中在《滞满所感》一书中宣称：日本为了“南满”曾花费20亿日元，有23万人付出鲜血。他声称：我们之所以在20年间赌国运打两次战争（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就是因为我们认为大陆扩张乃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利用中国资源是日本富强的惟一方法”，“日本政府必须确定经营满蒙的大方针”。田中表示，要为把“满蒙”变成“世界上最昌盛的殖民地而斗争”。1927年田中担任日本首相兼外长，主持召开了由陆军首脑、驻华使领、关

东军司令官等参加的“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积极政策”。这项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日本将实行“满蒙”与中国本土相分离的方针，使“满蒙”置于日本武力的“防护”之下。②日本将对中国内部事务实行武力干涉的政策。③确定对当前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方针。关于这一方针，甚至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也感到吃惊，武藤与田中曾就此事有一段露骨的对话：

武藤：……如此重大的方针，一旦付诸实施，必须估计到将会引起世界战争。。至少，美国不会沉默，英国和其他列强会跟在美国后面大吵大闹。在引起世界战争的情况下，怎么办？阁下有这样的决心和准备吗？

田中：我有这样的决心！

武藤：以后不致发生动摇吧？

田中：没问题，我已经下了决心。

武藤：政府既然有足够的决心和准备，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什么时候命令一下，我执行政策就是。

田中义一又于同年 7 月 25 日向日本天皇

呈奏《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文件，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该奏折露骨地显示了日本对外扩张政策：“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语言，把日本妄图并吞“满蒙”、征服中国的狼子野心，和盘托出。

制造九一八事变，公然侵占东三省。1931年3月，日本法西斯分子大造舆论，板垣征四郎声称：只用外交手段“不能达到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惟一的方策”是把满蒙“变为我国的领上”。另一法西斯分子大川周明在军部的资助下，到处宣称中国东北是“日本的生命线”，“满蒙”是日本以“10万英灵、20亿国帑”换来的“圣域”，乃“明治遗业的象征”，“全民族感情的源泉”，维护“满蒙”是日本的“自己权利”，如此等等。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蓄谋制造柳条湖事件，进攻沈阳北大营。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推行大陆政策，变中国东北为其殖民地的严重步骤。当然，这次事变与当时中国当局奉行的不抵抗政策，也不无关系。

制造伪满洲国。为此罪恶目的，日本侵略者转移人们视线，于1932年初一手策划了一二八事件，虽经中国军民的英勇抗击，国民党

当局仍与日本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当上海战争的硝烟尚未消散，1932年3月初伪满洲国即宣告成立，侵略分子板垣征四郎给一二八事件的点火者田中隆吉写信说：“幸亏你这样一来，满洲独立成功了！”

为了确保对“满洲国”的有效统治，新任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任驻伪满“大使”，并担任关东厅长官，武藤成为事实上“满洲国”的太上皇。武藤任命日本人驹井德三为总务厅长官，这一职务其实权相当于伪满的内阁总理大臣。1934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将“满洲国”改为“满洲帝国”，溥仪即皇帝位，年号康德，标志着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定型。

占领热河，大搞华北特殊化。1933年日军轻易占领热河后，即逼迫何应钦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协定确认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这样冀东至北平20余县成为不设防地区，华北门户洞开，为日本的侵略敞开了大门。1935年6月，日本胁迫中国签订《何梅协定》（何应钦、梅津美治郎）、《秦土协定》（秦德纯、土肥原贤二），通过这两个协定，日本侵略者达到从军事、党务、政治等方面削弱中国政府在河北、察哈尔两省力量的目的。日本并不以此为满足，还要进一步搞华北五省（河北、山

东、山西、绥远、察哈尔)的特殊化。同年 11 月,土肥原策动国民党河北省蓟密区督察专员兼滦榆区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 月日伪控制了察哈尔省长城以北全部地区,华北政治、经济危机空前严重。但是,1936 年 12 月作为时局转折点的西安事变发生,使日本分裂中国的阴谋暂时受挫,华北局势相对平静。不过这种短暂的平静,只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奏。1937 年 4 月,日军在平、津近郊演习。6 月,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一带频繁进行挑衅演习。与此同时,日本东京政界盛传“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的流言。果然在 7 月 7 日,日本侵略者悍然打响了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枪。

2. 群魔乱舞

日本侵略者悍然挑起全面侵华战争,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它的“大陆政策”的既定步骤,也是它企图避免经济危机和转移国内视线的一种手段。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内阁会议作出出兵华北的决定。7 月 11 日,又发表《派兵华北声明》,《声明》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手

法，诬称中国驻军“非法射击”，因而“发生冲突”，由此立即增兵华北。在短短的几天内，日本派往华北的军队，达到 20 万人以上。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日方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国驻北平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蛮横地限令中国第三十七师从北平市内及卢沟桥等驻地撤离。宋哲元对日军的大举进犯，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抱着一种“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的侥幸心理，与日方周旋。当谈判无法进行时，他就任命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平津绥靖公署主任、北平市市长。随后，宋哲元偕原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等人，秘密离开北平前往保定。这样，北平沦于日本侵略者之手。

在北平沦陷的次日，7 月 30 日天津市又陷于敌手两市的沦陷，给一些毫无民族气节的汉奸们打开了叛国投敌之门，这些败类奴颜媚骨，有奶便是娘，纷纷从阴暗的角落爬出来，争先恐后地充当日寇卵翼下的傀儡。地方维持会之类的伪组织，不断出现。一时间，京、津地区沉渣泛起，群魔乱舞。让我们对这批丑类中的代表人物略作介绍，以见一斑。

王克敏，字叔鲁，原籍浙江杭县（今余

杭)，1873 年出生于广东，1903 年中举人。1906 年任驻日副监督，监督留日学生的进步活动。1910 年任直隶交涉使。辛亥革命后，王克敏自觉宦途黯淡，于 1913 年留洋去法国。不久由法国回到北京，在袁世凯政府中任中法实业银行中方总经理。1917 年任王士珍内阁的财政总长，成为北洋政府的要员。1923 年，王克敏因致力于曹锟贿选，再次出任财政总长。1931 年，任北平财政整理委员会副委员长。1935 年一度担任代理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同年 12 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王任该会委员。该会设立经济委员会，王则被任为经济委员会主席。1937 年底南京陷落，王克敏在日本支持下，在华北拼凑伪“临时政府”。

王揖唐，字慎吾，号揖堂，别号逸塘。1877 年生于安徽合肥，1904 年考中甲辰科进士，同年入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在东京时王揖唐参加了留日学生总会，还担任安徽省分会的职员长。1909 年，王随戴鸿慈赴莫斯科，任赴俄答谢使头等参赞。不久，又赴欧美进行军政、铁路、交通及运输等项考察，历时两年。

辛亥革命后，王揖唐投入袁世凯幕下，历任总统秘书、参赞、顾问等职，深得袁的欢

心。1912年，王先后加入“民社”、“共和促进会”、“统一党”。袁世凯的御用工具“共和党”成立后，王任干事。第一届国会成立，王被选为参议员。1913年5月，“进步党”成立，王为理事兼宪法起草委员。1914年袁世凯召集所谓“约法会议”，王被选为议员。参议院成立，他又被选为参政。1916年4月，王出任段祺瑞内阁的内务总长。从此以后，他一直是皖系军阀的骨干。段祺瑞制造安福系国会，王揖唐成为该系干将，大搞选举丑剧，为人们所不齿。1919年南北议和，王又混上了北方议和总代表一职。1924年，段祺瑞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王被任为外交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委员。

1935年12月，王揖唐列名于冀察政务委员会，并和其他亲日分子把持外交、经济、交通等各特种委员会。他们放纵日本人与汉奸走私，帮助日本向平津运兵，网罗下台失意政客，协助日本开发华北军需物资总之一句话，大搞卖国勾当。

梁鸿志，1882年出生于福建长乐，字仲毅，又改字众异。十余岁即考取秀才。1903年赴省城福州参加乡试中举人，1905年又入京师大学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梁见段祺瑞

声势显赫，极力攀附。一次偶然的机，梁与皖系要人王揖唐在火车上相遇，臭味相投，相见恨晚。当时王揖唐正在组织安福俱乐部，梁即加入该组织，并当上了参议院议员，梁还担任安福俱乐部掌管财务的会计副主任。1924年，段祺瑞再次上台，梁鸿志又当上段政府的秘书长。1926年，驻北京的国民军推翻段祺瑞政府，梁鸿志只好随段退避天津，再做寓公。1928年，梁在大连筑临时小楼一幢，起名“爱居阁”，作为韬晦隐居之所。

1937年，在日本先后制造了卢沟桥事件和八一三事件后，上述北洋余孽、无耻政客及无行文人等大肆蠢动，相继投入日本侵略者的怀抱。

7月29日，当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等人潜离北平去保定后，北平即为日军控制。这一天，北平日军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及使馆武官今井武夫等，当即指使江朝宗组织“北平地方维持会”。江即纠合一批亲日分子，如原北平市政府秘书长周履安、北平市自治会监理处长吕均、北平市银行公会主席邹泉荪、北平市商会会长冷家骥、北平市社会局长周肇祥、保商银行行长王毓霖、朝鲜银行秘书梁亚平、东亚同盟会委员林文龙、北平市公安局长

潘毓萑等人，在江朝宗住宅南湾子 13 号召集筹组维持会会议。次日该会议继续举行，并成立“北平市地方维持会”，以江朝宗为主席，周履安、吕均、邹泉荪、冷家骥、周肇祥、梁亚平、林文龙、王毓霖、朱而芩等为常务委员。

8 月 8 日，日军进入北平并举行入城式。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主席张自忠出走，于是所有一切政务，概由常务委员齐燮元、贾德耀、李思浩、张璧、张允荣等负责处理。9 日，江朝宗就任维持会主席。18 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则推出江朝宗为北平市市长。19 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告“自动解散”。

几乎与北平陷落的同时，天津市于 7 月 30 日亦被日军占领。北洋时期曾任内务总长的高凌霄（1923 年一度摄行过总理职务），不甘寂寞，在日本主子授意下，出面组织维持会。“天津市地方维持会”于 8 月 1 日正式出台。高凌霄出任首任会长。

9 月 13 日，北平、天津两市地方维持会进一步成立“平津治安维持会”，而以高凌霄为主席。10 月 12 日，“北平市治安维持会”将北平改称“北京”。

“维持会”这一临时组织形式，显然不能

满足日本侵华的政治、经济、军事需要，为了使华北成为其独占殖民地，日本在这一地区筹建傀儡政权的工作，很快提上了日程。

一开始，日本对建立华北的伪政权，倾向于“联省政府”的模式，随着日军侵占地区的不断扩大，其侵略胃口也越来越大正如华北日军特务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北方应当树立的新政权，不是作为华北的地方政权，而是作为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府，使之在日本军势力范围内的全部地区普及其政令。”在日本看来，以地方政权作为招牌，名不正言不顺，缺乏号召力，一流人物不会参加；其次，地方政权是消极退让，缺乏进取思想，容易为南京政府的统一政策所压倒。

同年的 11 月 8 日、12 日，太原、上海相继失守，中国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华北日军特务部即策动在香港的王克敏，让他出面组织“政府”。王于 12 月初窜到北平，在日军特务部的导演下，与已在北平的汤尔和、王揖唐、齐燮元、董康、高凌霨等密谋进行。

这些人几乎是清一色的北洋政府的余孽，又共同具有根深蒂固的亲日媚日的思想，因此在日军特务部长喜多诚一的策划下，他们很快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组织大纲炮制出来。

组织大纲标榜“三权分立”，实行“责任内阁”和“总统制”设立行政、议政、司法三个委员会，行政委员会总揽政务，下设行政、治安、文教、法制、灾区救济等部。全称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个名称比起原来的“平津地区维持会”，当然显得有分量和排场多了。

12月14日，“临时政府”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宣告成立，委员有汤尔和、董康、王克敏、王揖唐、朱深、江朝宗、高凌霨、齐燮元等人。常务委员汤尔和任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文教部长，常务委员董康任司法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部长，齐燮元任治安部长，朱深任法制部长，王揖唐任灾区救济部长。“临时政府”以五色旗为“国旗”，而以《卿云歌》为“国歌”。“临时政府”的辖区范围随着日本侵占区的扩大，逐步从北平、天津两市扩展到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四省和青岛市，并在这些地区建立起省、市级政府。

日本精心炮制成立“临时政府”，并不是为了摆摆样子，而是有其罪恶的政治、经济目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军事占领区的扩大，从而对华北的经济肆意掠夺。首先是倾销日本商品。“临时政府”成立伊始。即改订海关税

率，不再征收日本商品附加税，同时减免棉籽、棉花、胡麻子、矿砂、生铁、废钢材等出口税。接着又降低所有日本商品的进口税。这样，在华北地区就充斥了日本的棉布、人造丝、海产品、砂糖、机械及零件、建筑材料等商品。

为了统制华北经济，1938年3月26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与王克敏签订成立中日经济协议会的《觉书》。该会以王克敏为会长，日人平生釵三郎为副会长，此人又是“临时政府”的最高经济顾问，只有他才是经济政策的最高决策者。日本还规定，对交通、港湾及通讯等项问题的处理，须由日本控制，协议会不得加以讨论。事实上，1938年4月，日本在北平成立了“华北开发公司”，由这个公司统制、开发、经营华北所有的交通、通讯、矿业、盐业、电力等重要产业。

为了达到破坏中国华北的金融，推行“以战养战”的政策之目的，1938年2月，日本批准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以伪财政部总长汪时璟任总裁，日人阪谷希一任顾问。3月该行正式营业，并在华北各地设立分行。6月该行将法币贬值10%。次年2日，更将法币贬值40%。这样做的目的是对法币从排挤

直到实行全面禁止流通使用。

日本通过派遣顾问，对华北傀儡政权进行全面控制，使顾问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顾问对“临时政府”的一切决策进行指导，而且掌握了人事任免大权，从而使“临时政府”成为日本名符其实的工具。凡设有顾问的各委员会、各部、各省市的长官，所有重要事项，必须征得顾问同意后，方得办理。除派遣顾问及辅佐官外，“临时政府”各有关方面所需专家、教授、教官等，也都由日军司令官负责推荐日本人充任。

日本除在华北地区成立“临时政府”外，又在华中地区加紧扶植另一傀儡政权——“维新政府”

1937年日军侵占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后，也在步华北方面军的后尘，日本华中派遣军网罗大小汉奸，成立地方性的伪组织。12月，上海浦东地区成立了所谓“大道市政府”，其旗帜为画有太极图的杏黄旗。

是年底，仅江苏、浙江地区，地方维持会陆续出现，其数目在20个以上。

1938年2月，日本华中派遣军为建立华中伪政权，属意于政界名流唐绍仪，唐心存犹豫，后又为国民党特务谋害，此事遂告中止。